

# 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

[韩]申斗焕

(安东大学 汉文系 韩国 安东 760-749)

[摘要]韩国现代社会因存在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文化的崩溃。韩国儒教经历了古代至三国时代、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以及现代儒学。儒教文化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一是以“追远报本”为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韩国;儒教;发展;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3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12-0024-06

## 一、序言:为什么又是儒学?

现代社会因产业化、西方化、都市化、巨量化、密集化、便利化、迅捷化等等之故,物质价值愈发获得肯定并领先于精神价值,因而产生了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文化的崩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企业的腐化和不道德的商业主义风行;2、家庭及社会共同体的破坏;3、自然环境的破坏;4、人性及道德的丧失;5、功利主义及排他主义的膨胀;6、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等等。近来,为了克服产业社会带来的问题,回到儒教、以儒教来解决问题的呼声在全球各地不断涌现。学者们的忧患意识和努力是受欢迎的,但对于他们的观点却有来自不同立场的争论。在韩国,围绕儒教而展开的或肯定或否定的争论有日趋活跃并深化的趋势。

韩国在1876年开放港口以后开始了产业化,1910年被日本占领国土后,作为日本的军需基地,产业化获得进展。光复后,因6.25战争,那一个时期的成长基础完全被破坏,在没有构建起自立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只好通过获得美国经济的支持来寻求安定。第三共和国以后开始实行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化有了进展,从1962年到1982年期间实现高速成长,形成了划时代的二次产业成长和大出口。从那以后,产业结构由轻工业换成重化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又进行了以服务产业和情报通信产业为中心的新产业化。

但这样的产业现象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网络情报通信网的发达为人提供了便利性的一面,但与此有关的电脑系统或利用电脑空间妨害公共利益,增加了对健康网络文化的侵害。近来,网络犯罪给不特定的多数人带来了很坏的影响。由此派生的人性丧失和道德性丧失造成了极度的功利主义和政治腐败。这样的现象渐渐地将人的精神世界变为一片荒芜。在这个缺乏道德精神的现实世界里,战争常年不停,犯罪到处发生,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们也牵连于各种腐败与贿赂当中。所有这一切皆源于极度的发展所造成的人性的极度丧失。

那么,面对这如同世界末日般的乱象,人类该以怎样的方案去应对呢?人们想起儒教。因物质文化的发达,这个世界已进入一日生活圈。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交流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加突出而需要给以特别重视。那么,在这样一种语境当中,儒教文化将扮演怎样一种角色呢?在这丧失人性的时代,儒教文化的现代意义又是什么呢?本文以韩国的儒教为中心,通过考察韩国儒教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揭示儒教的当代价值,探讨儒教的世界性意义。

[作者简介]申斗焕,韩国安东大学汉文系教授。

## 二、韩国儒教的起源与发展

### 1、古代至三国时代

关于韩国儒学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张志渊认为“檀君以后,殷国箕子<sup>①</sup>来到朝鲜,根据洪范九畴,制造八条禁法,在治理百姓的报告里能找到儒学的起源。”<sup>②</sup>认为洪范九畴形成了儒学文化的基点。李秉焘《国史大观》则推断“设置汉四郡时,通过乐浪,由那些移民们引入了儒教文化。四郡中的乐浪位于西海岸地区,和汉朝的本土有密切联系,同时汉朝的管理人员、商人、知识分子、富豪、农民等频繁往来,因此都市性的气氛逐渐成熟。估计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儒教文化自然地流入朝鲜。”<sup>③</sup>我们推测,正是在这个时期,朝鲜开始借用汉字并开始接纳儒教经典。之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在中央设置太学。太学是为了培养儒教性政治理念的人才而设立。在太学里用儒教经典五经和历史书等作为教材。在长寿王时期,有私立学校开始教授儒教经典和射箭法。而根据日本的纪录,285年百济的王仁博士传给日本《千字文》和《论语》<sup>④</sup>。有五经博士制度的百济则不仅推广儒学,还使用汉文编纂国史。

位于韩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与中国的交流有困难,只能通过高句丽或百济接受唐朝的文物。虽然晚出,儒教热风也在新罗刮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将花郎道教育发展成为儒、佛、道的综合教育。圆光法师的世俗五戒也是以儒教为基础制定而成的,其中出现的孝、忠、信等观念即是出于儒教道德。到了新罗末期640年(善德女王九年),新罗首次派弟子到唐朝的国子监入学后,有很多新罗的学生纷纷以“宿卫学生”的名义来唐朝留学。受学年限是十年,除了儒学外,还学阴阳学、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玄相允认为朝鲜儒学即起源于此<sup>⑤</sup>。

### 2、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

强首(?-692)是统一新罗时期的儒家学者及文学家,仕途上历任各种官职。他是儒学和文章著名于世的代表性学者,为儒教政治理念在新罗中代时期的确立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去唐朝留学时,他的父亲问:‘你要学佛教还是儒教?’他说‘我听说佛教是教导脱离世界,我是人间中的一人,怎能学佛教呢?要学儒教的道理。’”这句话在《三国史记》的列传里流传。它确认儒教是人世间切实的学问。

新罗统一三国后正式开始了儒学教育。神文王二年(682年)受唐朝的影响设立了国学,讲授《论语》和《孝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等。国学教授薛聪以汉唐儒学为中心,依照训古学的方法,用方言(朝鲜语)解读九经,并整理了比较混乱的吏读文字(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文字),使之系统化,对朝鲜古代文化和儒教经典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设置于新罗788年(元圣王四年)的读书三品科是发展儒教的巨大契机。这是本着儒教政治思想、以政治运作为目的而设置的。其毕业考试,是通过对儒教经典理解的能力考核,将学生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并作为选拔任用时的参考,这也是国学毕业生涉足官职的制度性保障建制。下品指的是读过《曲礼》、《孝经》的人,中品指的是读过《曲礼》、《论语》、《孝经》的人,而上品则是指读过《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精通文意而又同时懂得《论语》、《孝经》的人。特别是那些精通五经、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子百家书籍的人,更被尊为特品而被特招。从821年(宪德王十三年)新罗宿卫学生金云卿在唐应试登第开始,到新罗末期为止,登宾贡科者共有58人。宿卫学生追寻中央的儒教政治理念,通过在地方社会普及知识来维持罗末丽初的儒学传播。韩国儒学元祖崔致远(857-?)12岁去唐朝留学,18岁考中宾贡科,后起黄巢之乱,因写讨黄巢檄文而出名。他写的《桂苑笔耕》是韩国最早的文集。他精通佛教但却标榜儒家的学问,被认定为对儒教的发展贡献最大,所以配享于朝鲜成均馆文庙,并被追封为文昌侯。

太祖王建建立高丽的同时确立了佛教立国的理念。所以高丽的儒学振兴是在光宗时期开始的。958年光宗接受了由中国后周入籍高丽的翰林学士双翼的建议,首次实施科举制度,目的就是培养具备较好儒教素

①箕子是中国(商)的君主文丁(又称为太丁)的儿子,是纣王的叔父。

②张志渊《朝鲜儒教渊源》,汇洞书馆,1922年版,第1页。

③参考秉焘《国史大观》,普文阁,1961年版,第40-45页。

④尹丝淳《韩国学研究入门》,知识产业史,1989年版,第261-283页。

⑤玄相允《朝鲜儒学史》,民众书馆,1949年版,第14-16页。

养和能力的新官僚阶层。982年(成宗一年),成宗让京官五品以上者提交封事论,讨论政治的成败,采纳了参与讨论的崔承老等儒学家的上疏,决定采用宋制以巩固国家基础,并以儒教作为立国安邦的指导性原理。这个时期对振兴儒学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是崔承老和金审言。

成宗十一年(992年)设立了国子监。高丽王都很重视国子监教育。1109年(睿宗四年)为了使教学课程系统化而在国子监设置了七斋。七斋是七个专门讲座,有学《周易》的丽泽斋、学《尚书》的待聘斋、学《毛诗》的经德斋、学《周礼》的求仁斋、学《戴礼》的服膺斋、学《春秋》的养正斋以及学武学的讲艺斋。忠烈王元年(1275年)改为国学,同王二十四年(1298年)改为成均监,同王三十四年(1308年)改为成均馆,恭愍王五年(1356年)重新改为国子监,同王十一年(1362)又改为成均馆。

文宗时期,数一数二的名儒是崔冲,时人誉为“海东孔子”。崔冲辞退官职后,为了培养晚辈而开设私塾,因学生渐多,便建造了九个学舍,分别命名为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称“九斋学堂”。学科设置以五经三史为中心并加以诗赋词章。崔冲过世后,谥号“文宪公”,故其私学又称“文宪公徒”,成为科举考生的准备机构。崔冲将自己的哲学接轨并融入到对儒教经典的解释当中。

高丽时期振兴儒教的杰出人物还有金富轼(1075-1151)。他是高丽中期的儒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是典型的中世纪的儒教合理主义者。他的《三国史记》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而写成的。他的门徒尹彦颐(?-1149),精通《周易》,文章杰出,著有《易解》。

### 3、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

自高丽末期安珣(1243-1306)传入性理学以来,文风开始有所变化。安珣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扈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程朱理学,十分推崇朱熹。公元1289年,安珣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归国后便开始在太学引入、讲授朱子学,培养了众多文人,为高丽末朱子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安珣弟子白颐正(1247-1323)也是忠宣王的侍臣,也曾随忠宣王入元,并在元大都居留十余年,期间对性理学有了较深的关注,并对程朱的著作进行了研究。回到高丽时,带回了程朱的书籍与《朱子家礼》,传给了李齐贤、朴忠佐等。李齐贤在性理学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引进及发展性理学的同时留下了很多诗文。安珣的学问传统通过李齐贤传授给了李穡(1328-1396),此后经由郑道传、权近与卞季良等朝鲜初期性理学者得以传承。

关于高丽末期性理学的繁荣及其传承,郑道传这样说:“近代先有了像李齐贤这样的大儒,开始倡导古文之学,紧接着则是李谷与李仁复,现在牧隐李先生(李穡)很早就继承了稼亭(李谷)的训教,去中原留学,得到了渊源正宗的师友,穷究了道德与性命之学,并在回国后以此教导诸生。在此教导下而兴起的人物非常多,其中就有郑梦周、李崇仁、朴尚衷、朴宜中、金九容和权近、尹绍宗等,还有像我这样的不肖之徒也挤进了他的队伍中。”<sup>①</sup>他们的思想基础成为了朝鲜的建国理念。

### 4、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为止

性理学是朝鲜文化的鼓风机,也是伦理道德的渊藪。从朝鲜将儒教视为“国是”开始,文化的中心便由高丽时的佛教转变为以礼乐为内容的儒教。在朝鲜建国这个新的时空维度里,所有方面都为改革并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儒学精神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条件。这种上升的气氛不仅促成了文化的变化,奠定了艺术的方向,而且在文学上成就了一种新的诗文形态。

性理学的旗帜在所有方面都得到高扬和跟从,简直可以说成是一场性理学的革命。在这场世所罕见的巨大的精神变革中,儒学职能的转换和扩展,使其最终成为了朝鲜建国的精神支柱。而在这个过程中,郑道传与权近为儒教成为“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郑道传已经打好了朝鲜建国的儒教基础,所以宫廷、成均馆以及汉阳的城市结构也都建设得非常具有儒教文化色彩。在这种情势下,朝鲜的儒学开始了急速的发展。朝鲜在中央建立了文庙与成均馆,各地方郡县也都设立了乡校。朝鲜的天、地、人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了儒教新兴的气氛当中。世界罕见的朝鲜儒教革命,进行得非常成功。

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折衷郑道传的宰相中心的政治运营论与太宗的王权强化论,努力建设一个儒教化

<sup>①</sup>郑道传《三峯集》3卷序,《陶隐文集序》。

的理想国家。尤其是设立、运营了用以强化世宗王权的学问研究机关——集贤殿，并确立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强力的中央执权体系。

此后，因世祖发动癸酉靖难，朝鲜的儒林社会开始发生动摇。成三问（1418—1456）、河纬地（1387—1456）、李垲（1417—1456）、柳诚源（？—1456）、朴彭年（1417—1456）、俞应孚（？—1456）等六人因图谋端宗复位被发现而被处死刑，他们被称作“死六臣”。金时习、元昊、李孟专、赵旅、成聃寿、南孝温等六位大臣则辞官引退，终生不仕世祖，因此他们被称为“生六臣”，也被称作“节义派”。儒林社会虽因癸酉靖难而发生动摇，但朝廷中性理学的风气依然未改<sup>①</sup>。

十五世纪末，所谓士林派的新势力开始登上朝鲜政治舞台。出身地方、代表中小地主的士林派与从朝鲜建国时期开始独占权力与财富的勋旧派之间的对立，引起了朝鲜社会的政治斗争与思想纠纷。这种尖锐的对立直接导致发生四次大的灾祸，史称“四大土祸”，而每发生一次，士林派的力量便会受到一次凄惨的重创。在与勋旧派的较量中，用新儒学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士林派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这个时期出现的士林们具备儒教经传的知识与教养，并且是充满强烈实现儒教伦理意志的人，世人称他们为儒生。这些士林的学脉先由郑梦周、吉再传下道统，吉再隐居岭南后，其学问由金淑滋、金宗直父子传授，金宗直传授给了金宏弼、郑汝昌，金宏弼传授给了赵光祖。士林们出现后，朝鲜被新儒学重新武装，并通过学统与家统的传承过程而涌现出了更多的士林们，比较杰出的如李彦迪、李滉、曹植、金麟厚、徐敬德等。到被誉为“海东朱子”的李滉（号退溪）时，性理学已经发展得非常兴盛。李滉的学问传统由赵穆、金诚一、柳成龙、郑述、奇大升等继承，并通过李珥等性理学家们的融会贯通，朝鲜的儒学在规模和内容上更是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和发展，形成了道学的士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士林们的新文化，并且开始出现了要求推广新诗文、推行新儒学政治理想的一系列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书院，并培养了众多士林们。

临近十六世纪，朝鲜道学卷入了理气论争，专注于心性研究。当时最受关注的书是《心经》与《近思录》。李滉与李珥时代，朝鲜儒学达到了高潮，并以他们为顶点，分成了“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他们的心性论后来发展成性理学者们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人与物的品行或性质是否一致的论争，这就是所谓的“人物性同异论”。

#### 5、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

李滉与李珥之后，临近17世纪，朝鲜儒教陷入了“礼学论争”之中。继承栗谷学脉的金长生、宋时烈、宋浚吉等与继承退溪学脉的郑述、郑经世、许穆、尹鏞、李玄逸等之间展开的“礼讼论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这个时期，士林们读得最多的书是《朱子家礼》与《礼记》，并且涌现出了很多关于礼学的著述。其中，朴世采（1631—1695）是值得提及的人物，他对于性理学理论非常精通，对礼学也很渊博，著有《南溪礼说》、《三礼仪》、《六礼疑辑》等很多礼学书。其《东儒师友录》记录了从新罗时代到唐朝为止的学者们的学问传统，把握到了朝鲜时代性理学者的理论体系。

因李滉与李珥的出现而达到高潮的朝鲜性理学，将朝鲜变成了一个人文国家、道德国家。但是在1592年的壬辰倭乱前后，这个国家却直接面临了深刻的挑战。战争导致了社会的剧变，“壬辰倭乱”与1636年的“丙子胡乱”两次战争后，荒废的朝鲜社会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在应对危机和管理国家方面，性理学的功能和作用显得非常有限。接二连三的饥荒与疾病，受尽掠夺和剥削的农民阶层的动摇，党派之间的纷争，商人阶层的成长，以及从明朝输入的阳明学、天主教等的影响，促使人们开始对冥顽不化的朱子学进行自我反省。

十八世纪临近实学的时代，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柳馨远、李瀾、安鼎福、朴趾源、洪大容、朴齐家、丁若鏞、崔汉绮、金正喜等，他们全心追求洙泗学的修己治人之道，努力克服朱子主义的弊端，主张恢复儒学的固有传统；强调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再警戒要避免使儒学流向空理空论的形态。同一时代的岭南学脉，在李裁之后，则是由李象靖、柳致明相继承，而李震相、李恒老、田愚等作为朝鲜后期儒学的“主理论”者，其名声与影响则非常之大。

大韩帝国时代，代表儒教的学者主要有郭锺锡、崔益铉、金昌淑等。这时期朝鲜儒学的主流仍然是朱子学，唯朱子是从，唯朱子独尊。然而，以黄玗、李晚焘、安重根、李相龙等为代表的国权丧失期的儒学，则发展

<sup>①</sup>具体可参见《世祖实录》，12年4月19日（己未）条项。

出了独立的意志,具有自己的特点。

现在,在成均馆的文庙里配享的韩国历代儒贤共有18人,被称为“东国十八贤”或“东方十八贤”。朝鲜时代五百多年来,成均馆文庙的“释奠大祭”至今一次都没有断过。“释奠大祭”是祭祀中国的五圣位(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和薛聪、崔致远等韩国十八贤的仪式。在全国各地乡校的释奠大祭也一直不断。韩国的道德与良心出自于文庙。全国乡校就有214个,书院也超过了500多个。正因为如此,儒教在韩国至今仍然维持着它的命脉,代代相续,延绵不断。

### 三、韩国儒教的现代意义

在朝鲜流行的性理学究竟是什么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卷二)

这是张载《近思录》中的一句名言,也是最能表现性理学之学问性格与根本精神的一句话,是朝鲜儒生们冒死而为之的使命。儒学在孟子之后,道统中断,只因周濂溪的出现而获得重新整合。经过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等,直到朱子为止,一个新的儒学形态才宣告完成。这一新的儒学有多种称谓,如朱子学、宋学、道学、新儒学等。而代表这一新思想的学问就是性理学。性理学是探索人类心性性与宇宙之理相互关系的学问。

儒生们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儒教文化世界化的基础也正在于这个“大同世界”的设想。孔子在《礼记·礼运》中,对大同思想作了如下的界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栗谷李珣在《道峯书院记》中引用赵光祖的话语,对儒教义理作出了如下的解释:

格君心,陈王道,辟义路,塞利源。

这正是先贤所追求的作为儒生的基本道理。

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善良的心。孟子主张性善说,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人皆具有对人不忍的心,君王若能以不忍人之心而去行使对国民不忍的政治,治理天下就会非常容易。所谓“不忍人之心”指的就是恻隐之心的仁与羞恶之心的义,以及辞让之心的礼和是非之心的智。孟子在《孟子·公孙丑》篇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又说“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看到可怜者也不愿施以援手的人,犯了错误后也不感到羞耻的人,看到老弱者也不去礼让的人,看到错误也无法分清对与错的人,这些人都不应该被称作人。由孟子对人性的理解,我们可以了解儒教的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

《论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谓“仁者”;而所谓“博施济众”则是给予百姓恩惠,救济众多百姓,这已经超越了“仁者”的境界,连尧舜也都很难做到,因此如果真能做到“博施济众”,那必定是“圣人”。

茶山丁若镛对儒教的“道”进行直截了当的表述:

我一人彼一人,两人之间则生交际。善于际,则为孝、为弟、为友、为慈、为忠、为信、为睦、为嫵;不善于际,则为悖、为逆、为顽、为嚚、为奸、为慝、为元恶、为大愆。吾道何为者也?不过为善于其际耳。<sup>①</sup>

对于《论语·里仁》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朱子注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视真理比生命更加可贵,这是儒教理念之义理精神的表露,也是“舍生取义”精神的原动力。为国忠节的精神实质

<sup>①</sup>丁若镛《与犹堂全书》,《论语古今注·卫灵公》。

就是“国家无道 则为道而死。”立基此“殉道精神”,儒生们鄙视追求权利与利益的小人之行,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而慷慨赴义、前仆后继。在“壬辰倭乱”、国家危在旦夕之时,赵宪、郭再佑、高敬命、金千谟等,组织义兵奋起反抗,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忠义精神。而十九世纪末,抵抗日本帝国侵略的李恒老、崔益铉、柳重教、郭锺锡、安重根等烈士们也都来自于儒林。

经常说到韩国儒教的核心思想是“敬”,那么“敬”是什么呢?朱子在《四书集注》中用“主一无适”来解释“敬”,也即用心专一、心无旁骛的意思。但这并非是断绝与外部的接触,而是心身的收敛。故朱子又说:

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存得此心,乃可以为学。<sup>①</sup>

由此可见,所谓“敬”就是要心存畏惧、收敛身心而不敢放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如果经常这样做的话,气象会自然发生变化,这即是意味着人通过修养可以变化自己的气质。用“敬”来收敛身心、改变其气质,这是儒教修养的顶峰。朱子还指出“敬”的方法“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sup>②</sup>朱子说“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sup>③</sup>又说“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sup>④</sup>天理一直明亮,则人欲自然消治,气质自然发生变化。于是,由敬到诚,圣人之境至矣。“敬”乃儒教修养之基础和根本方法,朝鲜儒教之想象力与创造力都是以“敬”为基础而产生的。

韩国儒教文化的现代意义还在于“追远报本”的孝道。另外,儒教文化强调修养及反省。而作为修养与反省的空间,儒教文化与山水的关系非常深远。尤其是,韩国的山水巍峨秀丽,幽深雄壮,是很多隐逸处士隐居的地方,也是朝鲜的士林们避开浊世、修养身心、培养完德、修炼学问的场所。文人们吟咏诗词,培养了“思无邪”精神。抑制利欲、呼唤正义与伦理的儒教义理,可以使深受私欲左右和影响的现代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

美国的战略理论家及未来学者 Herman Kahn 推断,在二十一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将会没落,代替其位置的将是“儒教的资本主义”。他预测,重视教育的东方式思考方式、注重家庭与乡土的大家族文化、以信赖与礼仪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注重伦理的集团式国家意识、较强的儒教文化的同质感将会得到重视。而 Massachusetts 大学爱德华罗马尔教授则说“要有孔子,经营才能活跃”,并认为在强调伦理经营的全球化时代,儒教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sup>⑤</sup>。

目前,世界关心儒教文化的理由是,儒教文化深奥的哲学有希望克服混乱到极点的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样一种形势或发展趋势之下,深入探讨儒教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认为儒教文化可以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一是以“追远报本”为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在当今这个时代,韩国是一个孝悌忠信尚存而且最多的国家,是一个儒教的名分与义理尚存的国家,同时还是一个正在实践“大同”式儒教理想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儒教的研究,断绝与永存的话题也将会永远地持续。我们亲身体验过,深知文化断绝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大。传统的书堂文化突然转换为新式教育,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了非常混乱的境地。开化教育后突然地与过去断绝,导致了精神史的空白与混乱。韩国的儒教文化曾两次被断绝。第一次是因为所谓开港,第二次则是因外部冲击。因儒教文化被断绝而导致的巨大混乱,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得到。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被断绝的文化传统可以重新接续吗?

儒教在世界范围内被瞩目、被强调,是因为儒教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普世而崇高的道德价值。毁掉优秀的儒教文化,一瞬间就可以,但是要想重新接续或整合它,却可能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我们真诚地希望现时代的人能够重新回头审视一下这个被西式文明取代并丢弃的儒教文化,并祈祷不要再去任意毁损这个文化。

[责任编辑:杨晓伟]

①②③④《朱子语类》卷12,《持守》。

⑤The daily Focus, 2010. 7. 28。